

树棻 著

生死恋歌

周信芳与裘丽琳

文
汇
纪
实
从
书

文匯出版社



一个是操“贱业”的“戏子”，
另一个是富商巨室的闺秀。
一场对世俗和命运的抗争，
留下段轰动上海滩的“私奔”佳话。
四十五载荣辱与共，生死相依，
直至劫难和死亡带来离别。
但留下的恋歌仍在人回回响……

ISBN 7-80676-316-3



9 787806 763162 >

ISBN7-80676-316-3/G·162

定价：25.00元

树棻 著

生死恋歌

周信芳与裘丽琳



文匯出版社

文匯
纪实
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死恋歌:周信芳与裘丽琳/树棻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3. 8

ISBN 7-80676-316-3

I. 生... II. 树...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1441 号

·文汇纪实丛书·

生死恋歌

——周信芳与裘丽琳

作者 树 棻

丛书主编 萧关鸿

责任编辑 车明玉

封面装帧 周夏萍

出版发行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940 1/16
字 数 230 千
印 张 18
印 数 1—6000

ISBN 7-80676-316-3/G · 162

定 价 25.00 元

关于文汇报纪实丛书

纪实文学在过去二十年的发展状态,是任何文学样式在任何年代的发展无法比拟的。这令人欣喜,也令人忧虑。

欣喜的是纪实文学无论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形式的创新和变化,出版的速度和规模以及读者的接受和反应都已经在文学界和出版界一马当先。忧虑的是过快和过度的膨胀容易形成泡沫,而泡沫是不会结出果实,留下种子的。

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丛书,是因为我们作为媒体集团旗下的出版社对这种介于新闻、历史和文学之间的样式有着“血缘”的关系,特殊的兴趣和资源的优势。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将有丰富多样的题材和更丰富多样的色彩。传奇事变和热点探访,伟大人物和平民生活,历史追问和现实思考,文字特色和图像魅力,厚重份量和轻松感觉,能够熔于一炉,相得益彰。

一套丛书要形成自己的特色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在纪实文学这个领域里更其不易。我们的努力有待于读者的检验。

主编

前 言

1998年岁尾，我从加拿大转道美国回香港，到旧金山时照旧住在周易家中。从1995年1月，我俩都为参加她父亲周信芳百岁诞辰纪念活动到过上海之后便没再见过，算来已快四年了。旧金山的冬季也是阴冷天气居多，除掉白天里有时相偕出外去参观一些艺术博物馆或者到相近的金门公园中散步以外，大多时间都坐在家中闲谈，尤其是夜晚对坐在客厅中燃着熊熊炉火的壁炉边时，常会谈到第二天天色渐明。

我们谈雨果，谈司汤达，谈莱蒙托夫，谈契诃夫，谈德莱塞，谈亚马多……谈她在写的英文小说《On Fortune's Shore》和我在写的中文小说，谈一起度过和不在一起度过的那些岁月，谈她的家人和我的家人，谈我们共同的朋友……当然也还会谈到她的父母——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和妻子裘丽琳，谈他俩那段传奇式的爱情经历，谈他们得到过的喜悦和遭受到的苦难，谈他俩相伴相恋，生死与

共的一生……

离美回国后，我把这二十多天谈话中有关周易父母的内容经过回忆和整理，加入我原来便有所了解的一些事情，写成了部纪实作品，又从周易和她的兄弟姐妹那里取得了适合配用的照片，这便完成了这部拙作。

应当说这部拙作的素材来自各个方面，也包括了一些历史资料，但在动笔写作时我还是决定把周易作为书中的叙述者，一则因为她确是书中不少事件的讲述者，再则我认为由一个女儿来讲述自己父母的生平也会显得更亲切而动人一些。

周易(1975年摄)

目 录

前言/ 001

金风萧瑟中的老屋/ 001

久远年代里的故事：从苦力到富豪/ 007

艰难情侣/ 026

There's no people like show people, they smile

when they are feeling low./ 056

挣脱桎梏/ 072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084

燕归巢/ 094

“时穷节乃见”/ 103

达摩克里斯之剑/ 115

“天亮”之后/ 131

戏子——表演艺术家——全国人大代表/ 149

山雨欲来风满楼/ 168

我来给你讲个故事, 包管你胆战心惊。/ 184

梧桐半死清霜后, 头白鸳鸯失伴飞。/ 199

囹圄生涯/ 221

“湛湛青天不可欺”/ 237

大幕降下/ 247

身后哀荣/ 261

金风萧瑟中的老屋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五日，我乘坐的那架波音七四七型飞机降落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这座机场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离开中国之前，我从没坐过飞机，二十六年前告别上海时乘的是火车，那时候还没有开往香港的直通车，当然更不可能有直航的飞机。

只有一个人在机场接我，这是上海的旧友中惟一知道我这趟回来的人。他已为我订好了静安宾馆的房间，到那里安顿好行李之后，马上便到我家的老屋去，那里是我回到祖国后最急切想看到的地方。

朋友用钥匙开启了新换上的门锁，我俩便走进了长乐路788号的大门。当年，也是在这样金风萧瑟时节，我便是从这扇门里出来去火车站的。我的双亲并未送我到门口，但我能真切地感觉到，他俩正在楼上卧室的窗后向下注视着。只是我害怕转过脸面对着他俩时会忍不住哭出声来，因此始终没有回头，最后留给他俩的只是一个背影。

时隔二十六年，我重又走进这道大门，面对着头顶上那间卧室的窗户，但那里已没有我的双亲了。

在这四分之一的世纪中，风云变幻，沧海桑田，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土地上，几乎人人都经受过风风雨雨，同时也能看

得出来,我面前的这幢房屋也和许多人一样,经历过一段灾难和创伤的岁月,所以才显得这样苍老、陈旧,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荒败空荡的院落中,望过去就像一个颤巍巍地独自兀立在寒风中的老人。

据说,从一九六六年九月起,这幢房子先是被那些“战斗队”和“造反兵团”用作为“司令部”,以后又充当过“专案组”的办公场所和专门给“专政对象”办“抗大式学习班”的“班部”,最后一段时间这里是上海市群众艺术馆的馆址。据说,他们也是从一幢很大的房子里被撵到这幢只有六百多平方米的住宅房屋里来“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直到半年前,由于落实私房政策的最后期限即将届满,这才从这里搬迁到天蟾舞台的后台去的。

关于这幢旧居今后的归属,我曾听到过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是说政府有关部门将征用建为我父亲的纪念馆;另一说是将把产权归还给父亲的继承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但不管哪一种说法更为可信,这幢房子目前这种不忍卒睹的荒败境况总有一天会结束的。

朋友用另一把钥匙开启了中门,便进入房屋内部了。这里的每个房间看上去都比以前宽敞得多,原因是这些房间里都没有任何家具。所有原来的家具,从地毯、沙发到茶几、衣帽架,全都在一九六六年被送进旧货寄售商店里,售得的货款由父亲的工作单位——上海京剧院的“革委会”收缴。“家徒四壁”,这个词语也许应用不尽恰当,因为这幢房子里并没有人居住,并不是什么人的“家”。然而,在这幢房子里确曾有过一个家庭,这里曾经充溢着我们姐妹兄弟们的追逐嬉笑声,充溢着亲戚高朋们的谈笑声,充溢着管箫丝弦的协奏声,总之,充溢着显示蓬勃生机的和谐的声音。我的双亲从一九四六年搬进这幢当时的新居之后,便一直在这里面居住,直至相继从这座房屋和这道大门中出去……走向死亡。

我走上楼梯,二楼靠东那间是我父母的卧室,现在里面也是空无一物,我面向朝南的那堵墙壁,伫立了良久、良久。同来的友人问道:“你,在看什么哟?”

我指着那堵空墙正中处一块颜色稍淡的痕迹反问道：“你还记得过去这里挂着张照片吗？”

“当然记得啰。”他回答。

“现在那张照片到哪里去了？还能找得到吗？”

他有些惊异地朝我瞟了一眼，脸上的神情仿佛我提了个很可笑的问题似的，但随即又想到我并没有留在国内和大家一同经历那场“文化大革命”，便耸了耸肩，现出个淡淡的苦笑说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你说还会找得到吗？”

其实，方才我那句问话刚出口，便已意识到这一问是多余的了。四年前，有亲戚从上海到美国来的时候，就已经给我讲述过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第一回被抄家时的情景了：大批“红卫兵”冲进家里，到处涂写“打倒”、“批臭”我父亲的标语，还把大批戏装、剧照、衣服和其他东西搬进院子，堆成一大堆，浇上煤油，划根火柴，付之一炬。我问及的那帧照片虽然不是剧照，但按照片上人的穿着打扮来看，也必定会被看作是“四旧”而化为灰烬了。

虽然这帧我所挂念的照片已经不再存在了，面对着我的只是一堵空墙，但那帧大概早已化为灰烬的照片却仍旧十分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是一帧我母亲年轻时的照片，约莫有一面老式梳妆镜台那样大，镶嵌在椭圆形金漆雕花镜框里，由于是用油彩着的色，因此远看上去挺像一幅工细的油画。照上的人穿着一袭西式黑缎晚装，梳着高髻，侧坐在椅中俯首嫣笑。五十年代中期，有一位来自欧洲的戏剧家到我家来作客，走进会客室，一见那帧照片，便站住惊诧地叫起来：“Oh, How a beautiful lady!”^①当他知道这照片上的便是这里的女主人之后，便回头笑着对我父亲说：“Your wife is the most beautiful eastern lady that I see.”^②

① 英语：“哦，一位多么美丽的女郎！”

② 英语：“你的夫人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东方女性。”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的袁丽琳

那位欧洲戏剧家的话里也许是包含着恭维意味在内的,因为在欧美国家的知识界中往往把赞扬女性的美貌作为一种应有的礼节,但我也相信他那些话决非纯属应酬辞令,因为我母亲年轻时确实是个有名的美人。我还能记得,当我大约五六岁的时候,母亲带着我同坐一辆包车在路上拉过,经常有不少行人驻步回头,投来惊羡赞赏的目光。即使在那位欧洲客人登门作客的时候,她已年近半百,体形也已经发胖,但从她白皙的皮肤、挺直鼻子、灵巧的嘴唇和一对晶亮的大眼睛上还能清楚地看得出她当年的风韵。

一九六八年,当我从在纽约发行的一份英文报纸上得悉母亲去世的噩耗之后,极度悲恸之余,我曾经这样想过:以母亲当年的美貌和她对于戏剧的爱好,如果能够得到良好的训练,她是有可能成为一个有成就的演员甚至成为像阮玲玉、胡蝶那样的一代影后;从另一方面说,如果她听从于自己家庭的安排,那么她有可能成为一位豪贵夫人,仆从如云,车马成群,享受着各种受人羡慕的富贵尊荣。但是她并没有走这些受到不少人艳羡的生活道路,只是在她的少女时期便爱上了个“戏子”,以后便伴随着自己所爱的人走完了一生的路程,其中当然有称心和欢愉,但更多却是坎坷、忧虑、惊吓甚至是屈辱,但她却终生不渝,至死不悔。这使我想到法国大作家爱弥儿·左拉的夫人亚利桑蒂娜·左拉。她们两人的经历中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阿纳托尔·法朗士为左拉所致的悼词中对那位平凡而又不凡的女性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可是到目前为止,离母亲去世已有十六年了,但在几乎所有那些纪念父亲的文章中,纵然有提及她在那场浩劫中经受了和父亲同样的命运,但极少提及过她在共同生活的四十年中对父亲的生活和艺术所给予的影响。据我看来,在这些方面,她所起的作用也许并不亚于亚利桑蒂娜之于左拉的。

我在想:也许记述这些事情的人还应该是我们——他们的儿女,因为按照常理,子女对于父母的了解总能比其他人更多一

些的。

我也想,要是由我来承担这个记叙的任务,那么似乎该从他们两人的相识和共同生活开始讲起——

虽然我们的上一代中国人是出生和成长在一个封建和半封建式的社会里,但也并非所有人的婚姻都是根据父母之命配就的,其中也有一些夫妻是自由恋爱结合的,但即使如此,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这些父母也是很少会同子女讲述自己的恋爱经过的。但在这方面,我们的母亲却是个例外,她并不忌讳在子女面前暴露出自己少女时代的痴情,也觉得无需向子女隐瞒自己同他们的父亲结合经过。因此,下面所追叙的那些事情都是我在进入少女时期之后母亲在闲谈中向我讲述的——

久远年代里的故事： 从苦力到富豪

在这里,我还想把时间再推远一些,便是从母亲的家世,也就是从我外祖父家的情况讲起:

我的外祖父名叫裘仰山,但那是他发迹之后才起的名字。他原来是浙江省绍兴县安昌乡湖村的一个农民,由于在弟兄中排行第三,因此便叫裘阿三。在他十二岁那年,我的外曾祖——一个浙东农村里的普通农民——便生病去世了,据说患的是伤寒症。裘阿三十六岁那年上,他的母亲求人把他送进安昌镇上的一家糟坊里当学徒,十八岁上满师。二十岁上,他的一个师叔要到上海去开一家小糟坊,看他聪敏伶俐,便把他带到上海去当了名二柜伙计。谁知这家糟坊开张不到一年便倒闭了。于是,他便流落在上海拉塌车、推桥头^①,各种营生都干过,收入稍多时睡鸡毛小店,收入仅得果腹时便露宿在街头。以后总算由一位同乡保荐,进了当时开

^① 在桥堍边帮助推来往运货人力车上桥的苦力。

在英租界石路上的天成茶庄里去当了名出店^①，由于他干活卖力，生活节俭，让老板看中，调到了柜上。几年之中，升到了头柜伙友，颇受老板的信任。至此，他已跻身于长衫阶层，并且也积起了一些私蓄，在店里的地位已仅次于“挡手”^②了。老板还许诺过他：只等设在城里丹凤街上的那家分号正式开张，便把他派到那里去做挡手。

可就在他即将受到提拔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事：新年临近时，老板和挡手都回徽州同家人团聚去了，留在店里主事的就轮到他这个头柜伙计了。那一天，茶庄上来了个顾客，名叫阿尔斐特·罗斯，是个经营茶叶和丝绸的苏格兰商人，他提出要向天成茶庄购买一大批茶叶，先付三成货款，其余货款等明年他的商船从英国把洋布运回上海来时再行清偿。这位罗斯先生是天成茶庄的老主顾，过去同庄上进行过的几回交易虽都没有这么大，但在信用方面还是可靠的。而这样的付款方式，对其他外国商人也是有过前例的。再加运货的商船开行在即，即使派人赶去请示老板和挡手也是来不及了，而当时才传入中国不久的电报又是只归官方专用的。若是回掉这笔赊账，非但会失去一笔利润，同时还可能失去一个往来多年的好主顾。因此，这位代理店务的年轻伙计考虑之后，便决定接受这注交易，收下了三分之一的现金货款和一张由一家洋行保付的期票，便把那位罗斯先生所要的货发走了。

① 旧式商店里打杂差的下级店员。

② 旧式商店里的管事人，相当于以后的经理。